

75
1945-2020

印尼侨民林亚德讲述归国路(上)

看到五星红旗马上唱起国歌



印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亚德致辞祝贺新年，感谢上级侨联，各界社会贤达的关心支持，汇报一年来的工作，表达对新一年的期望

引言

林亚德(原名林永德)，1950年出生于雅加达，巴中67年届校友，他自小勤学聪慧，1966年就读高中二因封校辍学，6月23日单身回国深造。文革期间，1969年10月到永定上山下乡，他三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白天干活晚上凿壁偷光看书，从不虚度年华。1972年有入学名额他被村公社大队推荐到厦门师范学校念书，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自强不息成为该校的优秀生。磨刀不误砍材工。年轻有为的他因品学兼优，1974年被委派到厦门海沧中学任教，1995年到退休曾担任区政协常委和委员；担任2届的厦门市政协委员、海沧区侨联副主席；1997年任海沧实验中学副校长，兼任学校工会主席。退休后

任厦门师印尼归侨联谊会副主席。

一入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大门，他们就指着校门口“集美华侨补校”几个大字，感慨地对记者说：“50年了！好像什么都没有变。”

今年4月25日，印尼总统佐科下令在全国各地寻找印尼排华屠杀遇难者的万人塚——消息传出，上世纪60年代因此事件返回祖国的华侨们心绪难平，感慨万千。

本报记者找到了当年亲历者——50年前，他们漂洋过海从印尼归来，被送进这里学习时，还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，最小的也才十三岁。

时光荏苒，50年后，他们又回到了当年的住所。1950年生的陈玉曾，如今是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，陈中平、林亚

德、张健玲、连立康都是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成员。

回“家” 为了孩子求学 父母送孩子离开印尼回国

1965年，“九·三〇事件”发生后，印尼时局动荡。回国读书，是他们最为迫切的要求。但有的人清楚，父辈们内心还有比他们更深的隐忧。陈玉曾说，“爸妈让我回国，说我以前读书还可以，现在印尼没有书读了，要不然回国读书。”其实他自己明白，当时局势不好，爸妈内心也乱。

陈中平的父亲原打算先让大女儿先回国，“他认为女孩子在动荡的印尼，不安全。”年少的陈中平一听说姐姐要回国，也闹着要回国，陈中平说，在印尼没书读，中国是自己的祖国，可以继续念书，“我爸妈觉得先把两个孩子送回国也好，如果印尼形势真的不好，再全家回国。”

林亚德之前从未到过中国，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，“没有丝毫恐惧和陌生，当时印尼关于国内的宣传很多，我们对祖国也很了解，回祖国就像回家一样。”

姐妹年龄太小 跟着成年人合办护照

陈中平拿出了当年回国的飞机票(有照片)。那是1966年6月29日，他和姐姐从棉兰飞到雅加达，再飞到香港。

和其他几个人不一样，张健玲和姐姐回国时，姐妹俩一个13岁，一个15岁，都还没达到可以办护照的年龄，只好每人跟着一个成年人合办一张护照“蹭对方的年龄”，“对方的年龄和我的年龄平均达到16岁了就可以。”

林亚德回国时，再也拿不出钱的父母交给他两块手表、一个10克的金戒指以及两公斤的胡椒，叮嘱他，有需要的时候，把这些卖掉以解燃眉之急。1966年6月23日，林亚德和邻居一行6人，登上了一艘船，“当时整条船上都是回国的华侨，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大家在一起谈未来的理想，沉浸在幸福的气氛里。我们整整7天漂泊在海上才平安到达香港。”

“当时中央非常重视归侨。”厦大南洋研究院副院长施雪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当时中国政府有派船出去接这些印尼华侨，而华侨怎么回来，由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，以及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等印尼当地的侨团组织来统筹安排。

归途

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激动得不行

从香港过罗湖桥，林亚德第一次看到了解放军，异常激动，再看到五星红旗，立马就唱起了国歌。他说：“人离开家之后，才知道家的温暖；离开国家，才知道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什么，如果国家弱小，那你走出国门就可能被人家欺负，如果国家强大了，人家就不会那么欺负你。”他说，自己当时就想起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，连印尼的三轮车夫都会向他点赞说：“中国人，不错。”

“回国后，学生统一到广州的华侨学生接待站，等待统一分配，再到各个地方去。”林亚德说，自己一开始到了深圳，“什么都不要钱，还安排免费吃住。”后来转到广州，他还领到布票，差不多够买一件双层棉衣、一件卫生裤、一个被套以及一席蚊帐。陈玉曾到广州领到3元钱，用于给家里寄信、报平安，还领到了一个月的饭票。

不只是广东，施雪琴提到，当时在福建也设置了服务站，专门安置这些归国的华侨。她说，撤侨是个庞大而艰巨的工作，都是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与印尼各地侨团组织来协